



这种处方药带来的不仅是治疗方式的改变，更携带着新的文化和观念，影响着大众。台湾创作人李宗盛把蓝色小药丸写进流行歌曲，也把“性”福和幸福联系在了一起。

被砸过几次后，又重新开张了。

至于黎锦晖，在今天看来，相当于罗大佑之类的著名音乐人。彼时上海像样的唱片公司都以在入口放他的大幅照片为荣，这位音乐人是“金嗓子”周璇的领路师傅，大上海许多“靡靡之音”均出自他手。黎锦晖 1921 年来到上海的时候，满腹都是革命理想，所想的是推广白话文与平民音乐，不想却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，今天我们听《毛毛雨》，大概想不到这首曲子是当时批评的“黄色歌曲”之首。

“文妖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前人的深意早已被历史摧变成灰，但正是有他们的革命性行动，让中国人发现了“身体”。

“人们夺回了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力。”上海交通大学讲席

教授、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这样评价发生在 90 年前的文化事件。

曾经，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下，人的身体，也是集体的一部分，是集体活动中的一个环节。1980 年代以前，中国的足球比赛的赛场曾经冷静得像古典音乐会，组织者总是强调“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”，观众对双方进球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后来，去不去看球由自己决定了，球赛门票也要自己买了，观众掌控了肢体的“摇摆权”。

霹雳舞、摇滚乐、健身操迅速火起来，选美活动比今天的综艺节目更红火，模特很快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。“我的身体我做主”，对身体的个性装饰和个性表达，令这个时代喧哗不已。

2000 年前后，70 后女作家卫慧、棉棉分别推出了《上海宝贝》和《糖》，发出了 21 世纪的身体尖叫。评论家们把“身体写作”这个直白的标签贴在了这两位“美女作家”身上。

实际上，新世纪以来，身体在文学中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，身体更像是摆脱了灵魂的躯体，在城市中寻求感官的刺激。

“身体写作”比任何以往的叙事文本更加凸显身体的重要性。而正是这种“过于”强调身体的做法导致了争议。

无论是褒是贬，身体在 21 世纪已经不被遮遮掩掩。

一年之后，一个名叫汤加丽的女子又用她的身体向人群投出一枚“炸弹”，引发了一场“骚乱”。那一年，刚刚二十出头的汤加丽推出了第一本人体写真集《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》。汤加丽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报纸、网站、电视上，她被冠予了“中国人体写真第一人”称号。批评和谩骂之声充斥在周围，她的生活从此变得热闹、痛苦、不可控制。

“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，在中国，每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，还属于家庭，甚至还属于社会。”《汤加丽人体写真集》也因巨大争论而大卖，首印 5000 本，后来又加印了 5 万多本。

两年后，汤加丽又投掷了一颗炸弹，她的第二本写真集出版了。这次是汤加丽有意为之，是处在低谷状态的一种反抗。“我始终觉得我没有错，所以我出了第二本。我就是想告诉别人，我没有做错。这也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抗议。”

“每个人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我的身体是我的，要享受身体变化的每一个阶段。”在出版过两本人体写真集后，

